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吴晓明 /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吴晓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吴晓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309-12494-1

I. 论… II. 吴… III. 学术思想-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8475 号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吴晓明 著

封面设计/马晓霞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5 字数 191 千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494-1/B·587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

(项目批准号: 12&ZD1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 10JJD710003)

作者介绍

吴晓明 1957年生。1978年春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英国利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著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科学与社会》《形而上学的没落》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提要

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由于现代性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是从总体上进入一种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这种学徒状态在极为广泛的对外学习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并使学术在特定的境况中逐渐成长起来。但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是伴随着它开始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从而成为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学术。学徒状态的不成熟性特别表现在学术上的外部依赖或单纯模仿，因而习惯于采用“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即仅仅知道一般的抽象原则，并把这样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为了能够摆脱学术上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首先必须从外部反思这样一种主观意识的立场中解放出来；而在这方面能够给予我们深刻教益的，首先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因为正是这两位大哲在同主观意识的观点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中国学术形成自我主张的确切标记，正在于它能够切中并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深入这一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能够通过“文化结合”的锻炼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

序言

由于几位朋友的积极推动,使我有机会把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些论文搜罗起来,结集出版。这些论文的主旨是对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进行总体上的反省式思考,以便能够深入地把握其现状,并由之出发来论说它正在经历着的重大转向。

这一转向最为简要地说来,便是我们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将从其长期所处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由于现代性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学术是从总体上进入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毫无疑问,这样的学徒状态史无前例地开展出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进程——由之而来的获取对于我们的学术来说不仅是高度有益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却总是伴随着它能够逐渐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从而构成一种所谓“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学术。

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去理解这样一种重大转向呢?很显然,它根本不可能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在浮夸的辞令编织中便能够实现的目标。如果说,这一转向之最大的动因来源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展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那么,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从其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就不能不表现为一项艰巨的思想任务,一项唯经历“文化结合”之艰苦锻炼方能够实现的思想任务。当这样的思想任务还完全滞留于晦暗

中时,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就根本不可能朝着未来做出真正的筹划。

这样的思想任务首先表现为与主观意识之观点的批判性脱离,而主观意识之观点在当今的知识形态中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外部反思”中。所谓外部反思,总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却从来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不难看出,那种仅仅知道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一切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教条主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在先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曾经见识过这种东西,那么,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外部反思不仅依然盛行,而且几乎广泛地硬化为一种知识常态了。这种情形部分地来自于理智形而上学未经触碰的本质,更多的来自于中国学术界之长期的学徒状态。因为学徒状态在现成地、非批判地取得各种知识的地方,也最易于形成并巩固脱离实体性内容的外部反思。虽说外部反思的抽象原则似乎具有最坚实的客观性外观,然而,其本质恰恰是分割了“应当”与“现有”的主观主义。就像教条主义很正确地被理解为主观主义一样,黑格尔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把外部反思看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看作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对于当今中国学术转向的思想任务而言,如果说解除其学徒状态的首要之点在于同主观意识立场的批判性脱离,那么,获得其自我主张的根本要义则在于深入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项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思想任务,因为“现实”绝不像某种轻易的和无根基的见解所设想的那样,是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那只是一般的“实存”或“事实”);相反,现实(Wirklichkeit)是指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指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黑格尔

的逻辑学将现实概念放在“本质论”中，而不是放在“有论”中。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那么一切科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不难看出，为了把握住实存中本质的东西和在展开过程中必然的东西，是需要理论而且需要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的。同样不难看出，当我们把中国学术之自我主张的枢纽建立在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一基点上时，如此这般的现实便不能不与当今的世界以及中国的传统建立决定性的联系，因为，该现实本身正就是在这样的联系中方始获得其本质的和必然的规定的。照此看来，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不仅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学术”，要去研究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经验，而且意味着这种学术要真正深入本质性和必然性的领域之中，从而使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

对于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上述两方面的思想任务并不是彼此分离隔绝的，毋宁说，它们实际上只是同一件事情，就像中国学术之摆脱学徒状态与获得自我主张乃是同一件事情一样。在外部反思的主观立场未被中止的任何地方，社会现实就根本不可能映入我们的眼帘。同样，在社会现实尚未能够被把握之际，以外部反思为基本特征的主观主义学术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样的学术中，甚至连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也不可能被构成。因此，中国学术之赢得其自我主张的转向必须伴随着同外部反思之主观立场的脱离，并经由这种脱离而使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能够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积极地绽出。就此而言的思想资源将首先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相关，因为，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在对主观意识的观点进行最不妥协的持续批判的同时，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虽说马克思在现实本身的问题上彻底纠正了黑格尔，但恰恰是这一纠正方才拯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遗产——对于我们来说，这

笔遗产的核心正在于通过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及其全面的具体化来摆脱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正在敦促着建基其上的学术能够逐渐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如果说,这种自我主张绝不满足于空疏散宕的虚张声势,那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遗产——作为某种哲学定向或方法论标记——对于这一转向来说就会是本质重要的。

以上的叙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梗概,一种基本思路,收集在此文集的各种讨论大体是依循着这一思路来展开的。虽说就论文的内容而言大多是尝试性和探索性的,但我仍然愿望着以此来参与到中国学术之重大转向的历史性筹划之中。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只要这一转向真实地发生并开展出来,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就能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就能由此而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就能在中华文明再度青春化的行程中迎来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繁花盛开。

吴晓明

2016年仲夏

目 录

001/ 序言

001/ 一、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019/ 二、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035/ 三、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及其思想资源

059/ 四、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085/ 五、“中国学派”及其学术话语权

091/ 六、“中国学派”如何成为可能

099/ 七、论学术阐释的客观性问题

117/ 八、论中国学术的理论自觉

131/ 九、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

155/ 十、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

173/ 十一、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纲领

197/ 十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

213/ 附录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我的学术路
径回顾

一、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一种意义重大的反省性自觉正在逐渐生成。这种发展起来的反省最为切近地牵涉到中国学术的自我理解,亦即牵涉到中国学术对于自身之当下处境和总体性质的基本判断:它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是自我主张的,还是依仗外部权威的?虽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深深地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但它在理论上无疑将直接成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日益关切并不断经受考验的重大问题。

—

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几乎所有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某种学术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很明显,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术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一种学术坚定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为伟大的。

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的“我思”(cogito)开始。这一决定性的开端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意味着:哲学摆脱了它对哲理神学的依傍,而使思维——理性的思维——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黑格尔因此把笛卡儿称作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笛卡儿的原则是思维,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近代哲学正是从这一根本之点上,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并开辟出它的繁盛时期。与中世纪的哲理神学完全不同,近代哲学把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内在性本身)当作最基本的立脚点,从而“抛弃僵

死的外在性和权威”。因此，“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①。与此相类似，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哲学运动力图使“历史科学”摆脱它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要求成为自律的、自我主张的学术体系。这种自我主张意味着：“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统治的，而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②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显然一开始在基本立场和方法上依赖于并模仿着她的“长姐”（即自然科学），并长期处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学徒状态”。唯当所谓历史批判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家对“过去”唯一可能的知识乃是转手的或推论的（绝不是经验的），而这种转手性的知识也不能由经验来证实或实现时，史学理论方始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这一转折被称之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那就是发现，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而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③

就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和学术成果而言，情形同样如此。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任何一个民族之充满活力并能取得伟大成果的文化建构及其学术，只要它遭遇到足够强大的外来影响或冲击，都一方面表明它具有充分的容受性并因而能够积极地对外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必然表明它在发展进程中有能力获得其最坚决的自我主张。就此而言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希腊文化。尼采曾这样描述道：在很长的时间内，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而他们的宗教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因为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9页；并参看第59—63页。

②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61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并参看第269、319页。

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实的需要,换言之,希腊人终于取得了其文化上的自我主张。“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①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谈论某一民族之文化和学术的自我主张并强调其意义时,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事实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及其恒久的学术,虽说必有其独特的起源和传统,但往往都经历与其他世界历史民族的接触,并将自身置于“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所以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时说,虽说希腊民族的来源和它的语言学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其他民族(甚至追溯到印度),但是“精神”之真实的再生,却首先要在希腊寻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人一方面具有自己原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面对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正是通过这两重文化之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辟出自身的“胜利和繁荣的时期”^②。这一过程的真正核心是希腊民族取得其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自我主张。唯因其具备了这样的自我主张,所谓文化结合才显示其积极的和原创的意义来。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自我主张的原创性的胜利,而不是单纯的容受性。如卡西尔所说,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探寻自主性和容受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③。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一方面背负着自己过去的遗产,另一方面也面对着、容受着各种外来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就其基本的潮流和趋势而言,中国的学术无疑是普遍地进入一种“学徒状态”中去了,并由此而开展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和内容丰富的学习进程。这一学习进程

①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并参看第97—99页。

② 参看[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09—210页。

③ 参看[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是如此地波澜壮阔和激动人心,以至于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学徒状态中,中国学术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来说也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的思虑,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它深刻地出现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采取追问的形式,还是采取争论的形式。这种情形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学术不能不处于所谓“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即便是最诚挚、最虚心的对外学习,也不可能趋避于这种锻炼的艰难困苦。无论如何,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绝不是无谓的,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酝酿,也就是说,可能成为一种成果丰硕的积累;但其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学术必须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并从而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就形式方面而言,学术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标记首先关涉到语言现象。因为学术从本质上来说采取思想的形式,而思想总是为一定的民族精神所规模,并植根于这一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威廉·冯·洪堡曾深刻地指证了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的奠基作用: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呼吸”,它和民族精神是高度同一的;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有机体”,并具有不同的从内部进行创造的原则——每一语言的内在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①。因此,学术在特定语言中的发育、成熟、繁盛乃是该民族的学术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知道,德国人曾对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表示了无穷无尽的感激之情,而黑格尔则盛赞在哲学上罕有建树的沃尔夫所作出的“不朽的贡献”:因为这位“德国人的教师”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使哲学成了普遍的、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②

这个简要的提示性说法比通常的想象具有深刻得多的内容。就人文

① 参看[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33、49—50、52、72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第187页;并参看第188页。

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本质而言,根本不存在抽象的和无内容的“真理”,就像它根本不可能诉诸纯形式的或机械性质的“人工语言”一样。一种具有真正的生长力和自我主张的学术,只可能居留于特定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力图表明:语言是对先行于一切反思态度的世界进行解释的模式。“一切思维都被限制在语言中,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可能性。”^①反之,当某种学术的语言脱离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而僵化时,就像它把理论形式化和抽象化为“坏的无限性”时,这总是意味着思想的倾颓,意味着这种学术已然进入其终结阶段了(大体类似于斯宾格勒所说的由“大地”转变为“石化的世界都市”)。进而言之,当我们说“让某种学术讲某种语言”时,绝不是说只要一个民族操自己的母语来讲述或谈论某种学术,就标志着这种学术是自我主张的。海德格尔曾引述洪堡的观点说:一个民族有可能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使之完全变成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换言之,它可能不改变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规律,而把崭新的东西赋予语言,使同一个外壳获得另一个意义。但这种转化的条件是:(1)内在澄明——即让存在自身显示出来;(2)外部境况的守护——即防止语言脱离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而僵化^②。事实上,在所谓“文化结合”的场合,这种转化不仅发生在一个民族的当代语言与它所继承下来的语言之间,而且也发生在这个民族的语言与另一民族的语言之间。唯当上述两个条件具备时,一种语言上以开新为定向的建设性转化才是可能的;而唯当这样的转化实际地开展出来之时,我们才能说,某种学术在特定语言中是发育成熟了;它现在属于这个民族,并成为其学术之自我主张的形式标志。

二

如果说,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从形式上来说必然是讲“中国语”的,那

①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② 参看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2—53页。